

古代上海地区最早的通商港口——华亭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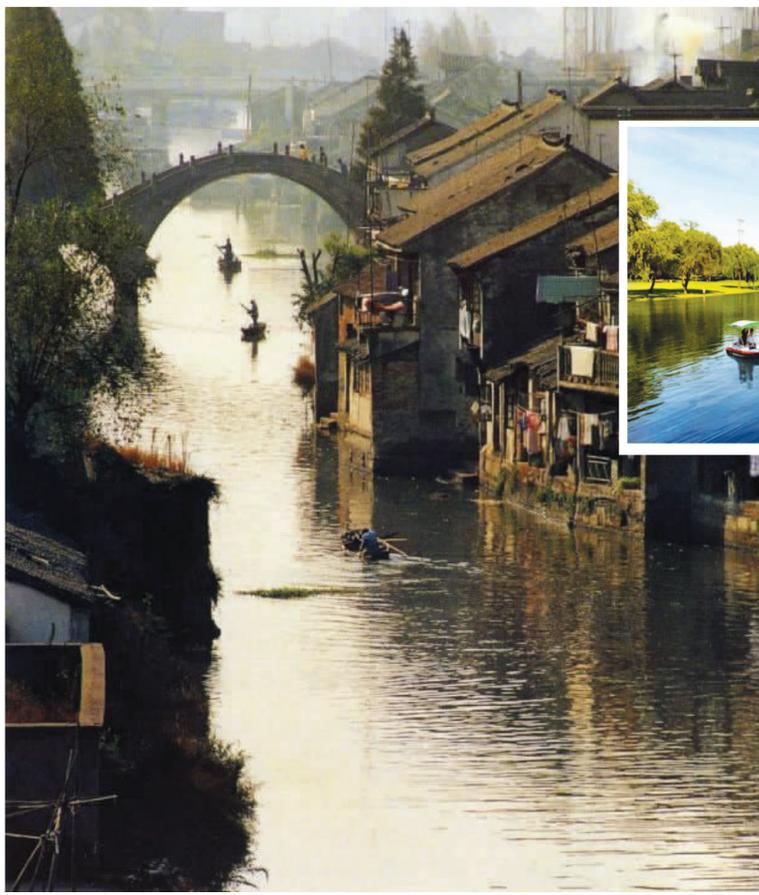
尹军

若问古代上海地区第一个通商港口在哪里,人们大凡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今为青浦区白鹤镇、旧为青浦镇的青龙镇。然而,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港口被人淡忘,它就是形成于隋开皇年间(581-600),位于吴淞江支流顾会浦旁的华亭港。

华亭港是唐建华亭县前就有的一个内港。之所以名为华亭港,大抵有以下原因:一是三国东吴陆逊第一次封华亭侯是以华亭谷为乡邑封地,华亭也因此最早见于《三国志·吴志》。二是至隋唐时期,汇集众多支流的吴淞江,入海口江面极为浩瀚,时称“华亭海”。此外,隋朝开凿大运河,使华亭地区的谷物和散盐得以便捷运出。据明代《松江府志》记,青龙镇建于唐天宝五载(746)。相传,孙权曾造青龙舰于此,故得青龙江和青龙镇之名。但青龙港作为贸易港口的记录出现在唐代。所以,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城镇当推青龙镇,而最早的通商港口为华亭港。

唐天宝十载(751),华亭建县,今上海地区从此结束了归属不定的历史,有了第一个独立完整的县治,治所驻地今松江老城区。华亭建县,得益于唐开元元年(713)重筑“长百二十里”捍海塘,使域内土地免于海水渍蚀之灾,疆域得以稳定,农业经济向好发展,人口随之增多;同时又与华亭港作为内港,青龙镇港作为外港,一地拥有两大港口不无关系;尤其是位于吴淞江与青龙江交汇处的青龙港,得踞江海优越航运条件,呈现蒸蒸日上态势。据日本僧人圆仁《入唐求法巡行记》载,唐代大中以后,来自新罗、日本的海船,也在北岸。此时的青龙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商港。时至北宋,记有36坊、烟火万家的青龙镇达到鼎盛时期。政和三年(1113),华亭始置市舶务,掌管华亭港和青龙港中外商船及征收税捐,后两浙路市舶司又移驻华亭。但此后吴淞江上游日益淤浅,下游日渐狭窄,给海船溯吴淞江驶入青龙镇港口带来困难,青龙镇逐渐式微,上海镇“蕃商辐辏”,终被取而代之。

上海镇是继青龙镇之后又一欣欣向荣的港口城镇。元至元十四年(1277),华亭升府,辖华亭一县,第二年改称松江府。当时,中国有七大市舶司,其中一处设立于华亭县上海镇。元建都于北方,南粮北运,陆路运输消耗太大,运河漕运又经常发生堵塞,海漕运输应运而生。



大港的昂首雄姿向世界强港进发。据悉,洋山港四期工程建成后,将助力上海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成为托举中国梦的一颗海上璀璨明珠。追寻由华亭港至青龙港、上海港、洋山深水港,承前启后的每一个港口,都承载着远行梦想,是出发后的到达,又是到达后的出发……



▲松江方塔,原名兴圣教寺塔,建于北宋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方塔园以方塔为中心,四周环绕宋代型仙桥、明代兰瑞堂、砖雕照壁、石雕围、清代天妃宫、陈化成祠、张弼古宅等。图/上海·松江网

▲松江四泾,街巷纵横、桥梁相望的历史文化名镇。明代著名文学家陈继儒称四泾为“云间鱼米福地”、“松郡商贾名邦”。十锦细锣鼓、皮影戏、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文化世代相传,海派历史风貌保护完好。图/松江新闻网

那些历史名人

程志强

话说当年清初翰林院里一帮文人闲聊家乡土产,学者汪琬故意沉默不语。众人问他:“苏州是天下名郡,您是苏州人,难道不知道苏州土产吗?”汪琬这才故意一本正经地说道:“苏州土产极少,只有两样东西。”众人忙问是哪两样,汪琬回答:“一为梨园子弟。”众人抚掌称是,汪琬却止住不说。众人急忙追问另一样是什么,待胃口吊足,这才徐徐吐出三个字:“状元也”。众人听罢,“结舌而散”。

借用汪琬的幽默,若问松江最负盛名的特产是什么?我说不是四大名鱼之首的四鳃鲈,也不是康熙皇帝赏赐的衣山兰笋,不是享誉海内外的松江大米,也不是衣被天下的松江布,而是灿若星河、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。

“历史名人多,是松江一大文化现象”(李君如《松江人物·序》)。当其他一些地方为争名人籍贯而笔仗不断的时候,松江人很淡定从容。是啊!唐建县,元升府,作为古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这里自然是钟灵毓秀之所、人文荟萃之地,有点能力的谁不想到府城求学、就业、定居、发展?唐宋元明清,从古看到今。翻开历代史志,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岂止是数百年,像“玉出昆冈”的云间二陆、“书画双绝”的董其昌、抗清殉国的陈子龙和夏允彝夏完淳、倡言“国有国格、报有报格”的史才……多少永垂史册的英名将永远令后人无限景仰!

不仅如此,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、中有松江”,松江特殊的区位优势、文化底蕴、经济实力吸引着江浙文化精英集聚于此。今天北上广,当年苏杭。你看,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——诸暨杨维禎来了,他的好友钱塘钱惟善来了,杨、钱二人与华亭名士陆居仁诗唱和,死后长眠沪上之巔——天马山,留下了高士葬高山,高风相辉映的千古佳话。永嘉黄公望来了,把九峰三泖的美景绘入了《富春山居图》。黄岩陶宗仪来了,在这里著成了《南村辍耕录》。翻开明清府县旧志,均有“游寓”或“寓贤”以记录虽非本地出生,但长期在此生活的名人。松江以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的气度,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,而寓居此地的移民也折服于松江的优秀文化传统,以成为松江人而自豪。如施蛰存先生生于杭州,七岁时全家迁居松江,他在自传中写道“辛亥革命,又迁居松江,一住三十年,遂为松江人”。从晋室南渡到宋室南渡再到今天来自海内外的移民宜居松江,多少代多少人就这样落地生根,“遂为松江人”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古文献学家、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,故乡是祖籍安徽泾县,然而他因受教于松江泗泾籍学者闻宥而对松江文化产生“爱慕之情”,表示“生不能得流寓松江籍贯之美名(像元末明初的陶宗仪、明季清初的朱舜水、当代的国画大师张大千),但死后鬼魂长依九峰三泖之间总是可以的吧。”后来,先生终于如愿葬在天马山公墓,一缕精魂和一腔挚爱都融入松江这片热土。

“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,建设新乡贤文化”,作为重点任务纳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。窃以为所谓“新乡贤”,不仅指“乡贤”的标准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一致,要体现时代精神,而且还要“厚古而不薄今”——不须言必称唐宋元明清,近当代的历史名人更具有现实意义;“乡贤”的美誉,并非古人独有,盖棺才可论定,也不必出生在松江,凡生活、工作在松江,凡松江人士及其后代走出松江、散布于世界各地,对社会有贡献、人品高尚者,皆可称“乡贤”;极而言之,像胡道静先生这样对松江文化极为爱慕又颇有研究,虽未曾流寓此地,也可赠以“荣誉市民”或“荣誉乡贤”的称号。总之,名人是乡土文化资源的灵魂,是文化建设的中坚,是文脉传承的脊梁。把“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”和“建设新乡贤文化”有机结合起来,充分重视名人资源,发挥名人效应,理应成为建设人文松江的重中之重。



▲(明)韩希孟顾绣作品《蝶》(上海博物馆藏)。发源于松江府的顾绣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人文松江

从崇祯《松江府志》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

熊月之

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,上海要“传承中华文化精髓、吸收世界文化精华、弘扬海派文化品格”,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美好愿景,也是一个涉及很广的宏大课题,其中包括对海派文化来源的发掘、梳理与研究。上海在单独设置县以前属于华亭县一部分,单独设置以后属于松江府一部分。近代以前,上海一直浸润在松江文化中。海派文化在近代以来才形成气候,松江文化是海派文化重要源头。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,诸如务实性、世俗性、开放性,在松江文化中都有丰富表现。要阐述松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渊源流变,自非这篇短文所可承载,这里仅从崇祯《松江府志》的内容,来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,进而分析其与海派文化的内在脉络。

崇祯《松江府志》有初刻本与重订本两个版本,分别刊行于明崇祯三年(1630)与崇祯四年。重订本仅存残本,比较流行的是初刻本。本文所述均基于初刻本。此志主修为时任松江知府方岳贡,主纂为松江著名学者陈继儒。与此前或此后的其他《松江府志》相比,此志一个鲜明特点,是相当务实与开明。一般说来,志书记一地史实,多隐恶扬善,誉多贬少,而对于负面内容多一带而过。此志虽然对正面内容也一一叙述,但对在常人看来所谓的负面内容也不加掩饰。用方岳贡的话来说,即“以志吾过而已”。正因如此,此志有许多关于当时民生疾苦的记述,也有许多不为他志所载的内容。

比如,志书收录徐献忠《布赋》,记述一家男女分工纺纱、织布、售布的情形:一家起

早贪黑,或去棉籽,或弹棉花,或纺纱、织布,然后持布到市场去卖。“织妇抱冻手不顾,匹夫怀饥奔走长路。持苧苧者以入市,恐精粗之不中数,饰粉傅脂,护持风露。摩肩臂以授人,腾口说而售我,思得金之如覆,媚贾师以如父。幸而入选,如脱重负。坐守风檐,平明返顾。”正当主妇洗好锅、备好水等待丈夫以卖布之钱买回来烧饭,不料丈夫哭丧而归,告知途中遭恶吏盘剥勒索,连本钱都被抢去了。(卷六,《物产》)书中附录张世美《织布词》,述织布之苦以及纺织在百姓生计中的重要性:“寸纱尺缕自纺绩,车经架刷趁风日。朝来喜得上机轴,家人不庆当窗织。当窗织,急生计,口食相关殆非细。湖上有田多不熟,日资一匹聊治济。朝织暮纺勤所为,机声轧轧犹嫌迟。阿婆近前催迫语,邻家易米待同时。”(卷七,《风俗》)书中直述松江因为重赋而带来生活困难,“纺织不止乡落,虽城中亦然。里媪展抱棉纱入市,易木棉花以归,机杼轧轧,有通宵不寐者。田家收获,轮官偿债外,未卒岁,庐庐已空,其衣食全在此。”(卷七,《风俗》)书中详细介绍沿海盐场工人晒盐熬盐之辛苦,记述一位负盐妇,其丈夫与小儿均战死沙场,大儿在军中生死未卜,家有公婆亟需赡养,自己只好负盐去卖。“负盐妇,何劳苦,百结青裙走风雨。雨花洒盐作卤,背负空筐泪如雨。”(卷七,《风俗》)这些记述,贴近民情,同情百姓疾苦。对于当时松江地区重赋问题,志书多处表示相当的不平之意。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。

书中动态性地记述了自正德以后一百多年间松江风俗的变迁,涉及二十四个方面,包括

乡饮、婚娶、丧祭、赠贖、宴饗、冠髻、服饰、履袜、组绣、布缕、染色、几案、舆盖、舟楫、室庐、园林、迎送、缇帙、楮素、巫医、方外、优剧、声妓与幢竖,总体趋势是由俭趋奢,由简趋繁,其始作俑者,“率巨家势阔先之”。将批评矛头对准巨家势阔,也需要一定的勇气。当然,这二十四变,每变都是很好的社会史资料。比如,述室庐之变,称松江城里,原先只有少量厅事堂楼,乡绅多居城外,现在情况大变,“今缙绅必城居,故宦宅第,转展相售。居必巧营曲房,栏榭台榭,点缀花石,几榻书画,竞事华侈”。书中认为,如果要改良风俗,必须自士大夫开始。(卷七,《风俗》)

最为了不起的地方,此书破天荒地把天主教传教士卢迪我(Diego de Pantoja, 1571-1618)作为“游寓”人物记录在册:“西儒卢迪我,利玛窦之门人也,精于天文地理技术,宗天主教,由海外抵香山嶼,至留都,遂游云间,士大夫多崇礼之,而徐宗伯光启尤敬事焉。制器甚精巧,如西洋炮,试之辽左,尤有奇效,奴虏闻之胆落。相驱目光棍,坦易近人,非礼不动,有中华大儒之风。他著述甚富,不胜书。凡用物名目、种类特创,并西字记号二十,形象各异,不能殚记,详其门下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《图说录最》一书,关西王公微有序。”(卷四十四,《游寓》)书中如此高度评价卢迪我,称其“有中华大儒之风”,为其他志书所未有之见。此志崇祯四年版的《游寓》人物传中,将“卢迪我”替换为“利玛窦”,记述文字基本相同,只是删掉“利玛窦之门人也”数字,另在“徐宗伯

光启尤敬事焉”一语后面,加了“入京都,卒,神庙特恩赐葬”,其余文字均同。查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利玛窦传记,均无利玛窦来松江的记录,此志不知何据。

晚明的松江地区,涌动着浓厚的实学思潮,为学讲究实际、实在、实用,主张经世致用,反对空谈心性。徐光启、孙元化等讲求农学、兵学、西学,陈继儒讲求有益地方经济、社会的实际之学。陈子龙、夏允彝等人组织的几社,便以经世致用相号召。《明经世文编》的编选者凡24人,包括陈子龙、夏允彝在内,全部是松江府人,其中20人为华亭县人。这些人中,有12人为进士,其余也都有举人或监生功名。对此书支持最力者,一是方岳贡,二是陈继儒。前已述及,在崇祯《松江府志》中,方、陈二人,一为主修,一为主纂,夏允彝也是编纂者之一。由此可见,崇祯《松江府志》中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记载,其实是松江士人实学思想的具体运用。

明清鼎革以后,江南地方势力遭到朝廷严重打压,以松江为中心的实学思潮也有所沉寂。康熙朝所修《松江府志》,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大为减少,卢迪我的传记也从《游寓》中删除。但是,松江文化中讲究实际、实在、实用的传统还在潜滋暗长。道光年间,上海开埠以后,这一传统便在上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助李善兰等刻印《续几何原本》的韩启陞,海派书画家胡公寿,以倡导经世之学著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钟天纬,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,著名天主教徒、实业家朱志尧等,都是松江府人。

多印了1300万册——

美国出版界被“营销”害死的“新锐”

李伟长

人吃惊,败亡也令人吃惊。商业世界里,一招臭棋足以搞死一家大企业。1998年,眼看形势大好,DK请来了绰号“营销王”的新执行官,做《星球大战》题材系列图书,市场预估500万册,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。但此人一意孤行,竟私自印了1800万册,超过预期260%。后果可想而知,1300万册烂在了仓库里。DK为此元气大伤,从此开始走下坡路。

虽说结果比较悲惨,但过程还是很“励志”。试想一个靠贷款一万美元的图书小作坊,能发展成为国际图书巨头,开创了全新图文工具书百科新模式,自然有其成功的秘密所在。克里斯

托弗·戴维斯说起DK成功路上的往事,也是神采飞扬,如数家珍。1975年,他们住不起单人房,甚至连一个书展展位都租不起,只好请出版商来旅馆看图书。最终,高质量的工具书引起了经销商的注意。

DK人的精神属牛的,很有韧劲,再苦也得扛过去。《我在DK的出版岁月》中有一个例子,相当有说服力。一本花了全公司六个月辛苦制作成的图文书,在印刷厂准备定版印刷时,遭遇不测,印刷厂失火,插图和照片全部烧了个精光,半年的心血顿时化作火焰下的灰烬。对于刚起步的小公司,这简直就是致命打击。怎么办?还能怎么办!DK人收拾收拾重新来过,从头开

始。那个时候,没有电脑,全部手工,得有多累!这就是DK的出版精神。其实,人何尝不是如此!毕竟,DK的主页是生产图书。关于这个商品,DK自有其坚持的理念。一要有质量,这是DK核心价值的天条,哪来的质量?舍得下成本。举个例子,“目击者”系列的每一页制作成本高达1000英镑,每本书的成本就是六万英镑,相当传统出版社的十本。二要有亲和力,强调用户体验,让读者感到好读好用。他们的排版理念是:没有无聊的题材,只有无聊的排版。三要以市场为导向,但绝不跟风,有独特的卖点,有别于业内竞争者。四要有权威感,让读者觉得书里的知识可靠,形成信任感。这便是DK产品的黄

DK是一家成立于1974年的国际出版社名称的缩写,全称是Dorling Kingdersley,两个老板以自己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单词合在了一起。该社以出版图文工具书起家,其“目击者”系列图文书,以数百万册的销售额笑傲全球。很多人可能不清楚DK具体出了些什么书,那瞧好了——《食材大全》《家庭医药指南》《医药大百科》,再有就是旅游指南、机械百科或者织毛衣指南之类的,是不是看上去“很不文艺”,像是攒出来的书?可人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畅销书,每本都卖了六七百万册,甚至上千万册,版权更是全球营销。别以为这类怪诞级出版人没有出版理想,DK的创意、编辑、排版和营销理念,都曾改变和影响了全球的图文出版事业。

DK出版的兴亡史,被出版社创始四大元老之一克里斯托弗·戴维斯写进了《我在DK的出版岁月》,其英文名——the rise and fall of DK,名副其实的浮了又沉。从贷款一万美元起家,到迅速扩张至整个欧洲,DK堪称出版界奇兵。无奈世事白云苍狗,好时光总是那么短,DK最终债务缠身,被出版巨鳄培生吞并。DK的兴盛令

金四条。DK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之所以能做到黄金四条,关键还是在于DK拥有独一无二的编辑团队。对于图书这类创意产业而言,人才是第一生产力。编辑才是核心驱动。编辑首先得得无私。其次还得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,至于与各路不同个性的作者打交道,那更是从业必备技术,比如能忍受带着牛粪味的稿子,因为约翰·西摩主张自耕自食,作品直接写在回收再利用的信封上,上面总免不了草屑和牛粪的味道。

凭借创新力和极富煽动力的营销,DK的业务突飞猛进,仅1996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.74亿英镑,但不断扩展的业务也带来许多问题,尤其是管理制度的困境,DK的创始人显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点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,网络搜索时代的到来,和网络百科的盛行,让工具书和图文书的出版社都面临转型。DK尽管在排版设计上足够有创意,但在数字产品时期的转身转得并不漂亮,不再是行业的引导者,这才是致命的。